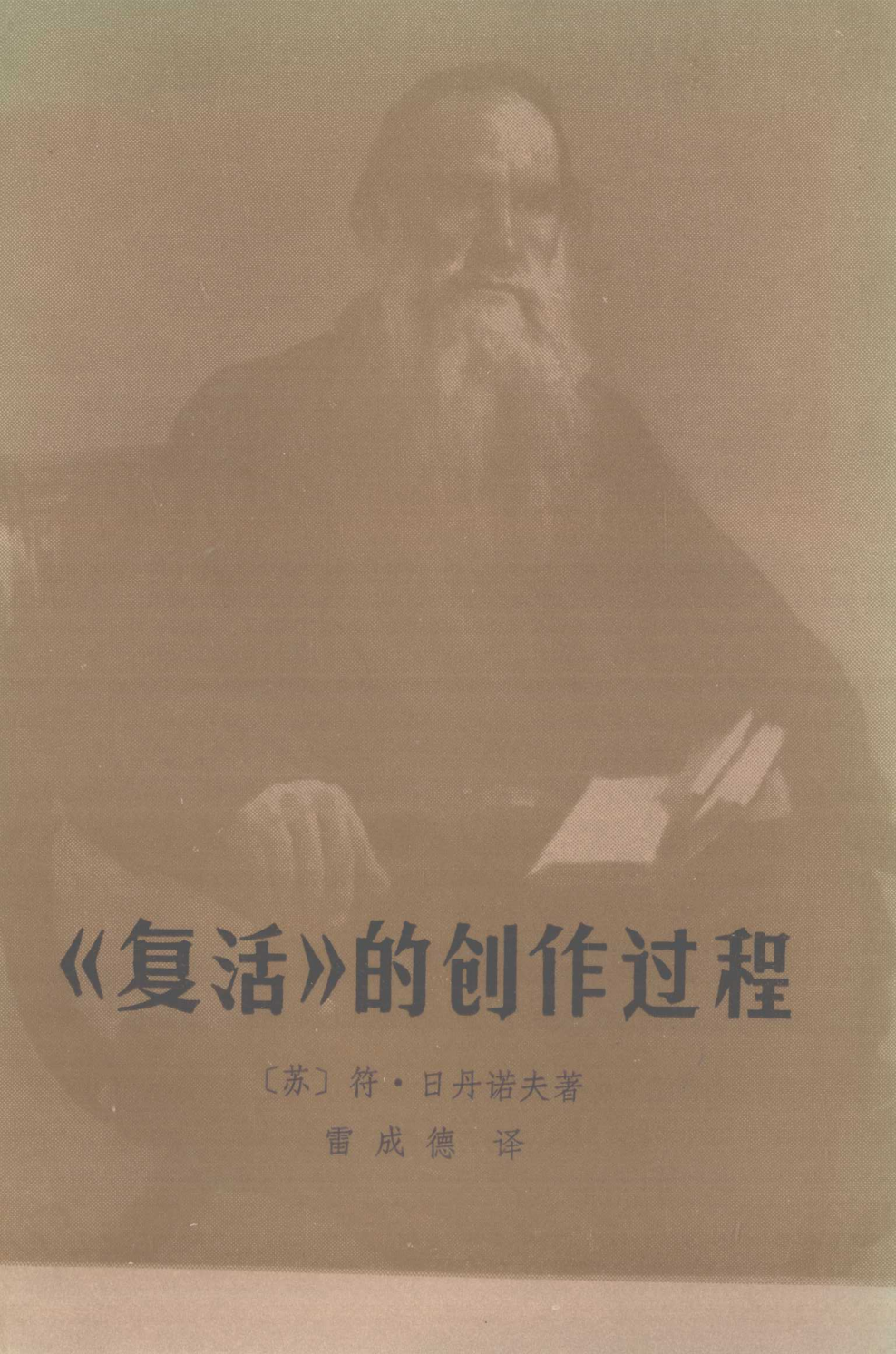




《复活》的创作过程

〔苏〕符·日丹诺夫著

雷成德译

《复活》的创作过程

〔苏〕符·日丹诺夫 著

雷成德 译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一九八二·呼和浩特

《复活》的创作过程

[苏] 符·日丹诺夫 著

雷成德 译

*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

(呼和浩特市新城西街82号)

内蒙古新华书店发行 内蒙古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3.25 字数: 294千 插页: 2

1982年1月第一版 1982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0,000册

统一书号: 10089·218 每册: 1.30元

根 据
«ТВОРЧЕСКАЯ ИСТОРИЯ
РОМАНА Л.Н.ТОЛСТОГО
〈ВОСКРЕСЕНИЕ〉»

译 出

В.ЖДАНОВ

«Советский писатель»

莫斯科 1960

内 容 提 要

《复活》是列夫·托尔斯泰继《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之后，创作的又一文学巨著。《复活》的创作历时十一年之久，六易其稿，呕心沥血，经过反复修改，付出了艰苦的劳动，终于使这部作品跨到不朽的世界文学名著的行列。

《〈复活〉的创作过程》通过对托尔斯泰手稿的考证与研究，以严谨的科学态度，觅寻和论证了托尔斯泰创作的思路、复杂的内心世界及其鲜明的艺术特色。本书为我们学习和借鉴托尔斯泰独特的艺术风格与写作技巧，深刻理解《复活》这一名著，提供了大量珍贵资料和生动事例，有较高的文学价值与美学价值。

前 言

列夫·托尔斯泰在新世纪前夜所写的《复活》是十九世纪文学光荣的殿军。在他的笔下，对被侮辱人们的维护，变成旨在反对注定灭亡的剥削社会制度的控诉书。

托尔斯泰的全部创作扎根于具体生活。源于生活激流的著名事件常常是触发托尔斯泰艺术构思的滥觞。偶然被托尔斯泰获悉的许多不平凡事件，其中包括一些法律案件是激励作者去表现它们的动力。我们想起两件事：一是给剧本《黑暗的势力》提供的情节；另一件是充作剧本《活尸》的梗概。法律案件也是托尔斯泰创作以其风格和热情不可重复的第三部——最后一部长篇小说《复活》发轫的动力。

《复活》的情节基础是一个不幸姑娘的故事，人们从当时担任彼得堡巡回法庭检察官的阿·费·柯尼的回忆录里得悉详情。柯尼叙说道：“七十年代前半期，有一天，一个面色苍白，痛苦不安的眼里，泄露出内心惊惶的年轻人来到我的办公室。他的衣着和风度都说明他是一个习惯于在上流社会交界周旋的人物。但是，他无法控制自己，向我情绪激动地抱怨起掌管监狱的副检察官，说他拒绝把一封事先未经检查的信件转发给一个名叫罗查利·奥尼的女犯人。我给他解释，监狱规章就是这样规定的，优待一些人，拒绝另一些人，都有规定，超越规定是不许可的。他激动起来，对我说：‘您立刻就检查吧，请您把这封信转交给罗查利’。罗查利是个芬兰妓女，由于她盗窃了一个喝醉了的‘嫖客’

一百卢布而被陪审员判刑。她的这笔钱，后来被她的老板娘，在塞纳胡同附近开设这家低级妓院的少校寡妇吞没掉。在法庭上，这位年轻姑娘带着一副由于喝酒和自己生活中的其他原因而干哑的嗓音，脸上依稀尚存当年的余韵风流，在任人玷污的嘴唇上仍然残存着几丝下流放荡的印迹，辩护人把被告称为用自己的翅膀燎烧着‘淫荡之火’的‘小蝴蝶’，发表了庸俗的演说，可是，陪审员没有听他的，法庭判决她四个月的监狱禁闭”。柯尼拒绝检查托他转交的信，要求年轻人复述一下内容。来访者提出了和判刑的姑娘结婚的打算，但是没有说明做出这个决定的原因。他出身于一个古老的贵族家系，毕业于高级贵族学校，在一个部里供职。柯尼长久地劝他打消这个冒险的决定。第二天，柯尼接到新相识的感谢信，说明他的结婚决定。他请求柯尼帮助他，以免狱官妨碍他们的婚姻。柯尼回忆道：“我还没有来得及复信，转达典狱长转告的罗查利的答复（她用文理不通，胡乱涂抹的句子说明她同意结婚），而在这之后过了一天，我接到了我的新朋友的一封信措辞非常尖锐，近乎辱骂的信，如他说的那样，他在信里，指责我干预他个人的打算”。但是，柯尼不愿意促成“这个神经颠狂的人竭力追求的不幸”，他要回避这件事，尽管“女狱管理机构和对这位年轻人的罗曼斯感到兴趣的某个公爵夫人施加压力。这时候，临近大斋期，刻不容缓的婚事，自然而然地拖延下去。我的新相识和罗查利经常会面，而且，在初次相会时，她一定向他提出，把她从禁闭室里叫出来。禁闭室里，充斥着疯狂的低级的叫骂，她也辱骂和她关押在一起的囚犯。他给她送来婚礼所需要的各种衣物：内衣，手镯和毛织品。她怀着喜悦的心情接受了这些，随后就在她的名下，全都寄放在仓库里。在大斋期临近结束的时候，罗查利患斑疹伤寒而死。等到他来会面时，听到这个消息，悲不欲生。为了纪念罗查利，他把为她准备的嫁妆，捐献给狱中女犯的孩子。从此，他就不再与我打交道了。只是多年

以后，他的姓名在俄国内地一个省副省长的任命名单中，忽然出现在我的眼前。可是，这个人或许不是他”。

柯尼继续写道：“三个月以后，女单人牢房里的女看守长，可尊敬的老太婆对我说，罗查利是个十分善良的好姑娘，她喜爱她，曾经向她诉说过这位老爷要和她结婚的隐秘。原来，她是一个鳏夫的女儿。这个鳏夫是彼得堡一位有钱的太太在芬兰省庄园里的雇农，他发现自己得了重病，便去彼得堡，在医院门诊就诊，诊断他的病是胃癌，活不了多久。他便请求庄园女主人，不要扔弃他的父母双亡的孤女，女主人答应了他，他死后，姑娘就被带到女主人家里。人们就开始打扮她，溺爱她，用糖汁娇惯她。苦难的日子终于到来了，或许，她任性得使人厌烦了，便把她派去当女仆。在所有的仆役中，只有她受过教育，直到十六岁。这时候，刚从高等贵族学校毕业的女主人的亲属、狱吏后来所说的求婚人还没有留意她。在女主人别墅消夏时，他诱惑了她，这个不幸的姑娘，而后来这件事被发觉，愤怒的女主人气势汹汹地赶走了罗查利，而不是她的亲属。后来，罗查利被诱惑者抛弃，生了孩子，把孩子送进育婴堂，而她本人一步步地堕落下去，终于，糊糊涂涂地沉沦到塞纳胡同附近的魔窟里。这时候，这位年轻人却在国内游历，在外省闲暇度日，移居彼得堡，立即混入日常和理智生活的一般轨道。在这舒适自在的生活中，有一天，命运安排他充当巡回法庭的陪审员，他从这个犯了偷窃罪而被判刑的不幸的妓女身上，认出了自己年轻时个人情欲的牺牲品”^[1]。

除了《复活》这个广为人知的情节来源的说法以外，还有另一个说法。这种说法当时一度出现在一本大型杂志上而被大家所遗忘。这就是名律师尼·卡拉布钦夫斯基关于他第一次辩护的回忆。他当时辩护的具体事件与我们所谈的问题无关。但是，在他的回忆录里曾经出现《复活》里叫做聂赫留朵夫的姓。这个人物是卡拉布钦夫斯基在公寓里的邻居，那时候，他们都住在彼得

堡。卡拉布钦夫斯基回忆道：“和我的房间并邻，住着某个T斯基。他是一位高雅的贵族门第出身的老爷，两年前，毕业于亚历山大洛夫斯基中学，没有固定职业，也不谋取职位，醉心于建立个人的哲学体系，生活十分简朴，从几乎被耗费净尽的世袭的祖先田庄里有一笔不大的进项，此外，每月还有固定的十八个卢布收入，这笔钱是国库拨给每个没有获得职位的法学院和中学毕业生的。T斯基有一对微微象卡尔梅克人式的睁大的，象煤块一样，闪光发亮的眼睛，还有好象画成的黑胡子和吊滞不动，有点死板黝黑的面孔，几粒麻疹，使这张面孔明显地柔合起来，呈现出近乎迷人的表情，——他个人的品质是出色而迥乎寻常的。无需多说，作为一个陪审员，正是在他身上发生了在当时的法律界引起如此喧嚣的事件，多年以后这个事件成为列·尼·托尔斯泰的名著《复活》的外在情节。在我的回忆录所涉及的当时，T斯基正处于促使他采取决定性步骤的精神状态之中。作为一个陪审员，他刚好遇上了自己的陪审期，他正式通过检察官提出和这位十六岁的少女，被包括他在内的陪审员判处盗窃罪的芬兰妓女结婚，从而了结这件人所尽知的丑闻，他设法获准，并到监狱去探望她。和聂赫留朵夫不同，他原先一点也不认识她，而且，从这个行动里，发现自己行为的哲学社会意义。和聂赫留朵夫相同之处在于，他也没有和这个妓女结婚，之所以这样，似乎并不是由于这个被判决的少女本人拒绝的缘故。

后来，T斯基来到农村，和一位门当户对的女邻居结婚，不久，他得了一种医生未能完全诊断清楚的脑病，猝然暴发，而意外地死掉了。所有的人都清楚，在他对被判刑的妓女反常心理活动剧烈的时刻，T斯基对法律界的一切相关人员，表现出浓郁的兴趣”^[2]。

对比两位回忆录作者提供的材料，一眼就看出之间存在的差异。卡拉布钦夫斯基认为，结婚的想法是这位陪审员某种哲学社

会动因引起的，在法庭见面之前，他从来不曾见过这位被告人。这一点，和作为《复活》情节基础的柯尼的说法不同。柯尼的回忆录是在这件事二十多年以后写出的（回忆录出版于1908年），卡拉布钦夫斯基的回忆录，比它早七年，也许是在出版的《复活》的直接影响下写出的。卡拉布钦夫斯基指出自己在公寓的邻居和小说主人公之间特别重要的区别，而柯尼提供了一幅和《复活》把女犯人关押到单身禁闭室之前相符的草图。同时，应当指出，柯尼和卡拉布钦夫斯基同属法律界，具有共同的职业兴趣，因而，不可能不交谈这件不寻常的事件。也同样应当注意到，卡拉布钦夫斯基公开自己的说法时，还不可能知道当时尚未写成的柯尼的材料，而柯尼后来也忘记了卡拉布钦夫斯基发表在期刊上的文章（否则，他不可能在自己的回忆录里回避它）。

我们必须研究这两种文献资料，并做出结论。两份文献在主要问题上没有矛盾。因为，柯尼的拜访者并没有向柯尼诉说自己的悲剧，根据他的言谈举止，柯尼完全有理由把他叫做“神经发狂的人”。柯尼只是在罗查利死了以后，从监狱女看守长那儿才听到他的过去的往事。卡拉布钦夫斯基的说法不仅不损坏柯尼说法的真实性，而且，还对聂赫留朵夫原型的，不大牢靠的说法补充了某些细节。绝不可能设想，托尔斯泰对以某种不大理解的抽象原则为基础的咄咄怪事感到兴趣；而是另一种理由——初看起来是一个人的一系列道德激情及其进一步发展的远景——攫住了艺术家。

1887年6月，阿·费·柯尼把罗查利凄伤悲惨的故事讲给了托尔斯泰，差不多也在那几天，演员安得列耶夫——布尔拉克也向托尔斯泰叙述了他在旅途中听到的一位萍水相逢的旅伴所讲的故事，这位旅伴诉说了他的痛苦——关于妻子背叛他的自白。这种或那种故事，讲给托尔斯泰都不会飘忽而去，不留痕迹的。

托尔斯泰完成了农民题材的剧本《黑暗的势力》，便沉浸在

哲学研究《论生命》中，但是，艺术创作的热望也不可能在他身上熄灭。在与柯尼会面前三个月，托尔斯泰阅读了斯汤达尔“最出色的长篇小说”《巴尔玛修道院》，他发觉自己“想尽快改变工作，去写艺术作品”^[3]。托尔斯泰一旦听到柯尼的故事，就立即发觉，在罗查利和她的诱惑者的故事里，饱含着写成一部艺术作品的巨大可能性。起初，他劝说，柯尼本人要写这个故事，“久久地等候着”通过文学润色的“优美情节”，他确信，“有才干的”柯尼的作家本领^[4]。

几个月过去了，托尔斯泰还没有忘记阿·费·柯尼的故事。对这个使他激动不安的新题材，他总是跃跃欲试。他曾经委托一位当时住在彼得堡的熟人，在柯尼那里打听。托尔斯泰问道：“他给《媒介》答应要写的故事是否已经动笔。如果没有，那末，是否愿意把这个故事情节让给我。我觉得这个情节非常动人，我非常需要它”^[5]。“这个美妙动人的情节，我要把它写得非常出色”^[6]。可是，这位朋友的答复却杳无音讯。过了一个月，托尔斯泰向柯尼本人提及：“一个时期来，我想写罗查利·奥尼^[7]和她的诱惑者的故事，也就是我想用这个题材，我请求得到你的许可，可是，你连一个字也没有写给我”^[8]。柯尼急忙复信给他：“您打算写罗查利·奥尼，写她的诱惑者（差不多在收到您的来信的同时人们把有关他的材料转交给我）的想法使我非常高兴，为了报偿您所提到的‘许可’，我热烈地请求您不要放弃这些想法。在您的笔下，这个故事将会触动每一颗已经变得冷酷的心，并且促使最糊涂的头脑开始思考起来”^[9]。

又过了两年半，托尔斯泰才开始写《柯尼的故事》，而写成它还需要十年。

我们没有提出评论《复活》的创作时代，也就是九十年代俄罗斯生活的任务，我们只是研究托尔斯泰这十年的创作道路中的主要因素。

当时，摆在作家案头业已动笔的艺术作品，有《教育的果实》，《克莱采奏鸣曲》。放下这些去写新作品是难以办到的。就在这几个月里，托尔泰斯曾经说过：“…今天，几乎要动笔写了。可是，当您珍惜思想的时候，始终耽心开头，好象用愚蠢的开端损坏它，玷污它一样”^[10]。而在这时候，什么也没有“开始”。就在他询问柯尼愿不愿把故事题材转让给他的同一封信里，他补充说：“头脑里很想写，我也知道，应当写什么，可是，我不能写作——内心里还没有涌起欲望”^[11]。过了两个月，托尔斯泰清楚地说出这种抑郁情绪的性质：“我一个字也没有写，但是，我没有说，让内心自然而然地也不工作”^[12]。

不稳定的情绪持续了很久。“我始终没有动笔——没有爬到书桌上来的任何欲望，而且，我不能勉强去写”^[13]——托尔斯泰在同年十一月末说道。又过了两天，托尔斯泰在回答美国女翻译家的问题时，说明了他没有动笔的原因。他说：“作品里的空洞话题太多了，而现在无论写出什么作品，人们总是千篇一律”。又过了三天，日记里出现了用另一种笔调记录的一段日记：“一种写作观点在清晨和起床以后，越来越经常地明朗起来，也许今天我就会开始我本人尚不知道的，但是我知道是属于那个方面的事”。在第二天的日记里写道：“我一直在玩纸牌问卜，写什么？这是一种指引着我的迷信——也就是向天主求卜问难，该做什么：做这个还是做那个？”但是过了一个月，托尔斯泰在自己的探索中，毫无进展，象先前一样，“思想犹豫不决，很想动笔去写”^[14]，“千头万绪，一齐涌现”。但是，他把已经开了头的那些作品的标题审视了一遍，就“什么也不想写了。令人感到惊奇的是——完全不想写呢还是一时不想写”^[15]——托尔斯泰在内心议论着。而在给十分熟悉“创作痛苦”的艺术家H.H.盖的信里，托尔斯泰用一些别的理由解释自己的畏缩不前：“我之所以没有写出任何东西，乃是因为写作欲望过分强烈——超越了力所

能及的限度”^[16]。

所有这些意见，从实质上说明了一个共同情况——托尔斯泰在新情节的探索阶段处于十字路口。创作因素逐渐聚集，可是，尚未汇成最后的冲动。在这种情况下，托尔斯泰阅读了刚刚接到的一些书籍，差点促成创作的冲动。人们把瑞士作家艾·杜·洛德的长篇小说《生活的意义》^[17]寄给了托尔斯泰，充满哲学和社会问题的洛德的作品使他和他的创作力量立即找到了出路。托尔斯泰在日记里断然写道：“读了《生活的意义》，有关战争和国家的描写令人吃惊，一定要写出呼吁书和长篇小说，也就是说出自己对于当代生活的看法”^[18]。但是，哲理性的呼吁书没有写成^[19]，而长篇小说也没有写出来。人们曾经错误地把日记里所引用的词语“长篇小说”当做未来的《复活》的构思^[20]。因为，在当时，《柯尼的故事》还没有清楚的轮廓，也没有谈论过长篇小说的规模。显而易见，写作规模巨大，广泛反映生活（写作“献给当代生活”的作品）的构思是在一瞬间产生的，可是，对于这类作品在当时还缺乏内在热情，而没有内在热情，绝不会着手写作的。在这个意义上，托尔斯泰写给构思写大型作品而又耽心没有良好创作条件的H.Я.格罗脱的意见是很有代表性的。托尔斯泰坚定地答复说：“您想写社会长篇小说的打算很可能是一种虚假的努力。要是这种努力是真实的，任何东西都不会妨碍您”^[21]。看来，托尔斯泰在当时也有同样的心情。他想写新作品，但是，正象1889年4月3日日记里所记的那样，他刚读了开头，便在《克莱采奏鸣曲》上停下来，而在几天之前，3月25日，重新写起《教育的果实》。

总之，由于几个月来恍惚不安，无所作为和内在酝酿的结果，托尔斯泰重新回到早已开始而保存的情节上来，这样做是符合逻辑规律的。他重新去创作这些作品以后，喜剧和中篇小说里所解决的问题始终激励着托尔斯泰，他真实地反映了当代生活的

事件。在《教育的果实》里，揭露出非常熟悉的贵族社会阶层。正好是托尔斯泰逗留在莫斯科期间，他特别精心地观察了这个社会阶层。散见在日记里的各种片断证实了作家无比的愤怒之情。

他本人决定把刚写好的论文《文明的节日》^[22]带去出版，老爷们的环境气氛使他十分厌恶。托尔斯泰愤怒起来：“这种富丽堂皇非同寻常，这些迷恋书本的人全都是伪君子”^[23]。由于另一个机会，他指出：“学者的议论多么空泛无味”^[24]。新年时，上流社会的熟人，在托尔斯泰家聚会的时候，立即继续讨论尚未完结的有关艺术的话题，托尔斯泰沉思般地慨叹道：“难道他们还没有感到无聊？他们怎么不去上吊——我不明白”^[25]。

托尔斯泰感到应当揭露老爷们的消遣娱乐，而且，把“老爷们的”文明生活漫画化。因此，在那些表面上无所事事的日子里，想写一部喜剧的念头并没有离开过托尔斯泰，从这样一件事看得出这一点：有一次，M·A·斯塔霍维奇从彼得堡来，他是托尔斯泰在上流社会的熟人。他们交谈之后，托尔斯泰在日记里记述了“猎犬奖金协会”^[26]的故事，不难推知，这个事情使托尔斯泰感到兴趣，正是为了《教育的果实》。

《克莱采奏鸣曲》的思想，不仅使托尔斯泰激动不安，也使他苦恼。贞节的思想始终吸引着他。在写这篇小说的时候，他感到和“性欲”斗争应当是首要的。托尔斯泰申言，没有纯真的婚姻^[27]，而且，他给自己新婚燕尔的年轻友人的信里说：“我不善于表达您结婚的消息在我身上所唤起的那种感情，非常遗憾……我感到悲伤，我想要说：您结婚了，但要象兄弟和姊妹一样生活在一起。一直这样生活下去，而让势必发生的事情在那里发生吧”^[28]。

当家庭、婚姻问题提得这样广泛，以致罗查利·奥尼的个别事件就使托尔斯泰失去了兴趣。吸引他的不再是《柯尼的故事》，而是《克莱采奏鸣曲》。但是，不管托尔斯泰对这个问题多么有趣，他都不能停留在抽象思想的背景上，具体生活的社会冲突使

他感到兴趣。在《克莱采奏鸣曲》里尽管极其鲜明地描绘了情节发展的社会环境（中等城市的知识界），可是情节仍局限在一般的伦理和道德原则问题上，对于这个问题，在《克莱采奏鸣曲》的《后记》里说得非常充分。艺术家没有用抽象思维的框子束缚自己，他酝酿出新的中篇小说《恶魔》，小说里叙说了—一个年轻地主婚前的两性关系。而《柯尼的故事》始终没有动笔。

中篇小说《恶魔》不同于《克莱采奏鸣曲》之处在于，它鲜明地反映出登场人物（老爷和农民）不同的社会地位，——但是还没有社会冲突。需要进一步深化主题，作家艰苦地思考着在生活里遇到的各种冲突事件，因此，不久前发表的莫泊桑的短篇小说《港口》吸引了他的注意力。这篇小说写的是一个可怕而独特的故事，一位水手在卖淫窟里和一个妓女幽会，而这个妓女却是他的姊姊。托尔斯泰几乎从来不翻译作品，可是，他却把这篇小说急忙译出并发表在期刊上^[29]。

不合理的社会生活使托尔斯泰激动不安，而且不止一次地提到柯尼的故事，这暗示要提出比《恶魔》表现的思想更加复杂的新问题：被地主少爷糟蹋了的无辜的姑娘的堕落。在解决个人生活的许多复杂问题方面，继《恶魔》之后，中篇小说《复活》成为当前的要务。小说里聂赫留朵夫的主题更占据了主导地位。

而且，象往常一样，在那些年代，托尔斯泰赋予艺术创作，作品内容和技巧以特别重大的意义。正是在这个时候，他开始在论文里，清楚鲜明地提出了自己对艺术的看法^[30]。托尔斯泰对熟悉艺术问题的艺术家盖说：“必须去写。照我看到的那样去写，而除我之外，谁也没有看到”^[31]。关于自己的思维活动，他在日记里写道：“这样关心形式的完美是件奇异的事情。这种关心不是徒然无用的，但是，只有在内容美好的情况下，这种关心才不是徒劳无益的…要使作品浸透着美好的内容，就必须使艺术作品鲜明”^[32]。可是，前不久，托尔斯泰给同一个盖写信说：“必须

去做，而且反映心灵里已经成熟了的東西，…要使人们觉得你对人们说出了某种新鲜的、重要的和急需的东西”^[33]。

着手创作《复活》的时刻迫近了。在着手制订未来长篇小说第一张草图的那些日子里，托尔斯泰怀着一种怎样激昂的心情，这可以从当时没有写成的一篇论文中判断出来：“我们，信仰基督的人民现在所过的生活、生活方式——是不是应当被破坏呢，我曾经说过，而且在它〔没有〕受到破坏以前，我将坚信这一点。或许，在我死的时候，它还没有被破坏，但是，我不是孤零零的一个人，成百上千的人和我站在一起，真理和我站在一起。它将来必然要受到破坏，而且很快就会被破坏。它之所以遭到破坏不是因为革命者、无政府主义者、工人、国家社会主义者，日本人或中国人破坏它，而它之所以将被破坏，这是因为它的主要方面已经被破坏了——它在人们的意识里已经被破坏了”^④。

这段话写于十一月三十日，而在十二月六日的日记里写着：“关于柯尼的故事的构思越来越鲜明地浮现在头脑里，直到第二天，我总是处在欢欣鼓舞的心情中”。三周过后，出现了开始创作的笔记。笔记牵扯到另一件事，叙述了《教育的果实》的演出印象：“上演我的剧本，的确，我觉得，剧本对人们产生了影响，他们所有的人在心灵深处感到羞愧，从而苦闷。我始终感到羞愧，由于在贫苦人们中间毫无理智的挥霍浪费而感到羞愧…昨天，二十六号，早晨，意外地开始写柯尼的故事，似乎写得不笨。昨天，上演我的剧本，没有人民出场，大家都感到沉重”^[35]。

《复活》的第一张草图是以柯尼的故事为基础的，一直写到主人公（未来的聂赫留朵夫）来到法庭。无论是后来的，还是法庭上的情节，当时都还没有。所写的纯粹是心理主题。可是，社会上的不平等，无力自卫的人们的悲剧，都已经尖锐地反映出来，随着每一个新的补充，这些主题便加强起来。

1890年2月的日记里写出了后来的创作计划：“散步时，花了

很长时间思考柯尼的故事。一切全都明朗和美好。1.他不想占有她，但是，他之所以这样做，乃是因为他认为应当这样做。在他的印象里，她非常迷人，他显出微笑，同时又想哭。2.来到教堂，一片漆黑，白色的连衣裙，接吻。3.老女仆拿来一把钱，而且用忧郁的眼色看着。4.老女仆是个宿命论者，卡邱霞孤零零的一个人。5.她看到他坐在火车上，便要投卧火车轮下，但是，她蹲下来感到婴儿在蠕动。6.他向姑母打听她的下落，地主家的女仆室，她和男仆的同居关系，生活得十分糟糕。她认为不能不同居，在她身上激起了肉欲。7.他心情激动地问：“您们到底赶走了？她怎么痛哭流涕呢？我真犯罪了吗？”等等。8.试图走追逐名利的道路——很坏，不合性格，在国外——巴黎——淫佚放荡——情况更糟。只好读书，追求雅致的风尚，打猎、玩牌、范例。梳妆发型——苦闷无聊”^[36]。

业已动手的作品的特征是鲜明的。就在同一个1890年的二月初，报纸上发表了轰动一时的助产士斯库布利斯卡娅和她的助手虐杀婴儿的犯罪消息，民情沸腾，到处一片谴责声（后来照样发生）。托尔斯泰根据这件事写了一篇论文。和一般的情绪相反，他的控诉不是指向具体的杀人犯，而是指向“政府、教会和公论”^[37]。当他写出自己愤怒的文字时、举出许多事实。“在华沙，妇女斯库布利斯卡娅虐杀婴儿，大约将近一百个，…在我们图拉，去年，判处了一个强奸自己女儿的农民，…在图拉，还有其他一些案件——一个小伙子把个十五岁的姑娘拉到树林里杀死，炼油，但是，没有炼出他所需要的烛油”。托尔斯泰讥讽世界上这些触目惊心的事实：“这是些野兽。把他们全都绞死还不够”。“我们的政府这样高尚，以致不能容忍斯库布利斯卡娅们，制造烛油的穷苦父子所做的那些事”。政府“道德高尚”的标志之一就是组织卖淫。“千千万万个不仅失去自由，而且丧失人形，注定早亡的妇女在奴役中毁灭，政府竟把她们组织起来卖淫”。政府成立育婴堂，

“在这些镶着花木地板的育婴堂里，杀害孩子的数目，几千个斯库布利斯卡娅还赶不上”。政府“为了在公民中间推广真正的道德观念”而成立了法庭。“在我们俄罗斯尽管摆出一副样子，举行有陪审员参加的公开审判，实质上，这种公开审判只是运用到适应居民道德堕落需要的程度”^[38]。

论文的要旨只有一点：犯罪的不是那些被法庭判决的不幸的罪犯们，而是培植他们的社会环境。这个思想，十分接近《复活》的思想，促使深化新中篇小说的情节。柯尼的故事，结尾是宣告法庭审判的消息，但是，对法庭审判过程本身却未写出一词一字。《复活》的第一张草图只是把情节引向法庭。由于《复活》内在的发展，法庭场面是必不可少的，它的出现和外在的冲击无关。可是斯库布利斯卡娅的案件不可能不影响托尔斯泰，促使他尽快去揭露法庭。处理的方案成熟了，终于在六月，采用了这个处理方案：“必须从法庭审判期开始柯尼的故事”^[39]。

《复活》的题材超越了“柯尼的”情节，而对周围生活的观察，只不过加强了新的处理方案。

“一副淫荡、酒色和烟毒的可怕表情……在莫斯科，大家公认，有八千个领执照的妓女”，——有一次，托尔斯泰在莫斯科街头散步归来后写道。在农村，人们告诉他踩坏几根田禾这样微不足道的小事，对此，托尔斯泰在日记里写道：“调解大会确认了法官的判决，把踩坏田禾的两个妇女关进监牢，这件事，使我非常吃惊。这一伙强盗——法官、大臣、沙皇为了掠夺钱财，就残害人民，毫无心肝”^[40]。

托尔斯泰决定从聂赫留朵夫和玛丝洛娃在法庭相遇写起以后，便动手研究法律诉讼程序本身，把这件事放在应有的位置，所得的印象只能加强作家的愤怒情绪：“暑热和令人羞愧的喜剧，可是，我所记的是天性所需要的东西”^[41]，——他在日记里写道，怀着这种心情，1890年12月14日开始了《柯尼的故事》的第二个草